

公孙龙子答客问



贤哲自述丛书



周昌忠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贤哲自述丛书

郭志坤 主编

周昌忠 撰

公孙龙子答客问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公孙龙子答客问/周昌忠撰.
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2

(贤哲自述丛书/郭志坤主编)

ISBN 7-208-04029-X

I. 公... II. 周... III. 公孙龙(前 320~前 250)—
哲学思想—问答 IV. B225.4-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4339 号

责任编辑 王卫东

封面装帧 沈兆荣

周剑峰

美术编辑 邹纪华

贤哲自述丛书

公孙龙子答客问

周昌忠 撰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7.5 插页 5 字数 153,000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,100

ISBN 7-208-04029-X/K·926

定价 17.40 元

“贤哲自述丛书”总序

才德佼好谓之贤，识见超人谓之哲。在漫漫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，涌现出了难以数计的贤士哲人。他们犹如灿烂的群星，闪烁在万里碧空，犹如擎天的立柱，支撑着华夏民族的大厦。贤哲，我们民族的精华。贤哲，我们民族的骄傲。贤哲，我们民族的象征。我们不能没有这种精华。我们不能没有这种骄傲。我们不能没有这种象征。一句话，我们不能数典忘祖。对每一个中国人——哪怕是最普通的中国人——来说，都有一个了解、熟悉民族的贤哲，并从他们身上吸取精神养料的问题。

这些年来，对贤哲的介绍也不是一片空白。对其人其事作一些浅层的表述，有的还加以某种演绎和图解，这样的作品还不少见。应该承认，这也是有益的，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必要的。但如果仅止于此，就不怎么可取了。对贤哲的人生历程，大事渲染，音容笑貌，绘声绘色，或高，或矮，或胖，或瘦，一一刻画得栩栩如生，那样做，说到底也只是触摸到了贤哲的外在躯壳，至于贤哲的内在气质是没有触及的。那样的作品尽管也可热热闹闹，风靡一时，但对承继民族传统及精华，似乎不相干。

贤哲的内心世界是一座高度学术化的宝库。打开这座宝库，展示这座宝库，把宝库中的一件件学术珍品向世人作

一点介绍、剖析,使人们懂得:哦,我们中国的历史宝库中还有那么多好东西,我们可不能自贱自卑呀!进而学会从这一宝库中吮吸养料,以充实和完善自己。

我们正在着手做的就是这样一件把学术和文化送向民间的工作,让哪怕是只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们也懂一点“学术”。历史上人们每每称道“学术下移”,这,也算是吧!

要让学术深入于民众之中,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适宜而贴切的表述形式。

我们取的是让贤哲自己站出来讲话的“贤哲自述”的形式。

贤哲已长眠于地下千百年,逝者无言,何来“自述”?不,那样看似似乎太简单化了些。从肉体角度看,贤哲们已消失,已逝去,起逝者于九泉之下而“自述”之,岂非天方夜谭!然而,贤哲之为贤哲,是因为他们的论著犹存,他们的精神没死。千秋评说,涉足于史海学坛的弄潮儿,总是要唤起先辈贤哲的英灵,来表述自我的心迹的。鉴于此,我们何不将贤哲的英灵请到前台来,让他们“自说自话”一番,详言其身世、际遇、学说、业绩,甚至对后人的千秋评论发表一点“感言”,如此这般,岂非妙哉?!

当然,我们的主旨还在于介绍,但这是浅化学术的介绍,这是深化内涵的介绍,与一般的介绍文字不尽相同的。

既然是“自述”,那么势必要有问有答了,有“客问”,也有“贤哲答”。“客问”提出的是学术界、社会上关切的诸多问题,有些是常年争讼不休的“热点”、“难点”,决非隔靴搔痒。“贤哲答”,实际上是让贤哲超越时空,站在今天读者面前作面对面的答疑,既解答生平、事迹、思想、理论,也可评判历代研究者的种种评说。答疑涉面可以广泛,但都恪守“言之

有据”的原则。所答内容大致上是学界的定评和定论，也有一些是笔者长年研究的心得所在，只是托贤哲之口道出罢了。

在撰稿过程中，我们深感这种将古人“起死回生”的表述方法，对“学术下移”是大有益处的。一是生动、活泼，使历代贤哲直面读者，对读者来说，那是如闻其声，如睹其人了；二是可熔学术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炉，比起那些单纯的图解和表层的介绍来，要“沉甸甸”得多，称这些文字为“浅化了的学术专著”，不为过。

参与撰写这些“贤哲自述”的，不少是学界的佼佼者。他们深感写这样的文字，比起写那种正儿八经的学术作品来并不轻松，因为那要浅化。浅化是件难事。深入才能浅出。你如果不深入，一味求浅，说不准会将贤哲的鼻子眼睛给描歪了。再说，“深入”了也不一定能“浅出”。“深入”有道，“浅出”有术。这里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述方法问题，也有驾驭文字的功底问题，于此，几多学术巨擘还自叹“浅出”无方呢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正在学习，正在摸索。当我们把这套丛书一本本地推到读者面前的时候，是否会得到读者诸君的赞许和首肯呢？我们期待着肯定的回答。

郭志坤

1997年5月1日

目 录

第一章 其人其书其事	1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赵人公孙龙——“子秉”非公孙龙字——《公孙龙子》非伪托之作——《公孙龙子》传世源流——名辩者生涯

第二章 名辩思潮主要代表——公孙龙	3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名学嚆矢——名家兴起——辩学形成——“名辩”蔚为大潮——名辩思潮主要代表公孙龙

第三章 《公孙龙子》的哲学——思辨的语言分析哲学体系	6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《公孙龙子》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——思辨的哲学——关于知性的哲学——语言分析哲学——逻辑思想——体系结构——《公孙龙子》篇目的逻辑次序

第四章 本体论：存在包括个体和共相两界	8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关于存在的哲学学说：本体论——偶然和必然的存在、现实和潜在的存在——物的世界：分离的个体——共相的世界：类和性质——类：潜在的存在和作为实体的共相——性质：独立自在的共相——本体—性质对立

第五章 认识论：知性水平的认识	12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认识主体的意识——知性思维概念——知性认识本质——知性认识独立自在的性质——感性认识现象——感性认识的分离性——从认识现象到认识共相

第六章 语言哲学：语言意义理论	14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意义和指云的划分——客体词和概念词的划分——概念词的等级划分——语句结构的分析——指云的客观性——指云的决定——指云的辨识——指云的变化

第七章 逻辑学：知性思维的基本原理 177

朴素知性思维原理——原始的确定性和分析性——形式性和精确性的缺乏——同一律思想——矛盾律思想——概念的逻辑——系词的逻辑

第八章 “二十一事”和“七说”解读 197

存在包括共相和个体——共相和个体别异——个体同属于类——知性概念和客体——认识依赖知性思维——知性思维超越经验——知性认识推进常识——名是人给予物的称谓——概念词之间的不可比性——概念词之间的不等同关系

第九章 《公孙龙子》的历史命运 217

昙花一现成绝学——“怪”、“小”、“贱”而不容于中国传统主流哲学——“遗产”由“小学”传承——兴微继绝自唐初露曙光——“金子”终于在近代发光——现代又几成显学——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启示

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226

第一章

其人其书其事

赵人公孙龙——『子秉』非公孙龙字——

《公孙龙子》非伪托之作——《公孙龙子》传世源

流——名辩者生涯

客问：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出现两个公孙龙。唐代司马贞（《史记索隐》）和张守节（《史记正义》）都说两者是一个人，并且指的就是您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答问：这是一个大误会，谬种流传，甚至到20世纪还有人信。其实，太史公本来说得很明白：“公孙龙字子石，少孔子五十三岁”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），“而赵亦有公孙龙，为坚白同异之辩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。请注意“而”、“亦”两字。审语意，即可明白世有两个公孙龙，更不用说，子石是孔子弟子，而我，也就是“为坚白同异之辩”的“公孙龙”，同孔子六世孙孔穿同时代，上距孔子卒年几近二百年。这本来一清二楚，无隐可索，无疑义可正。偏有好事者如司马贞、张守节，平白生出一桩公案。以讹传讹，及至康有为还在孔子“七十弟子”中特别提到“公孙龙传坚白”（《论语注序》）。他说我的学说传自孔子，更是匪夷所思。实际上，即如“坚白”之说，庄子说起于杨朱、墨翟时代（《庄子·骈拇》），但这并不确实，还是现代的郭湛波说得对：“‘坚白同异’之辩，是惠施时代的辩题。”（《先秦辩学史》）不过，讹传止于智者。宋代王应麟就已根据我曾是平原君赵胜门客的身世，判明司马贞之非（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）。清代俞樾更说得透彻，孔子弟子之公孙龙决不可能同孔子六世孙孔穿辩论（《庄子人名考》）。

客问：《史记》记先生为赵国人。可是，怎么汉代高诱说您是魏国人（《吕氏春秋训解》）呢？

答问：这也事关“验明正身”，有必要申明一番。我是赵国人，这已见诸众多典籍（《史记》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东汉许慎《淮南鸿烈间诂》、《列子·仲尼》、西晋司马彪《庄子注》、唐代成玄英《南华真经注疏》）。高诱说我是魏国人，也是事出有因。我早年去过魏国，与公子牟相善交游（《庄子·秋水》），还同魏王论学（《列子·仲尼》）。可能因为这个缘故，高诱误以为我是魏国人。不过，诚如谭戒甫细心察知，事有蹊跷。高诱注我为“魏人”，载于《应言》篇，而以前诸篇也屡屡谈到我，他却未就我的籍贯着一字。所以，谭戒甫言之有理：“似非原本如此。或浅人以《应言》前段系言魏事。”（《公孙龙子形名发微》）除了误我为魏国人，还有人说我是周国、齐国人（清代陆心源：《陌宋楼藏书志》）。惟此说信者寥寥，因为“此明人臆说，不足置辨”（胡道静：《公孙龙子考》）。这里我还想说说孔子弟子公孙龙的籍贯，因为有时人们把他的籍贯误认为是我的。东汉郑玄说，他是楚国人（刘宋裴驷：《史记集解》），张守节据《孔子家语》说他是卫国人（《史记正义》）。他在后世还得到追封，唐代封为“黄伯”，宋代封为“枝江侯”。

客问：唐代成玄英（《南华真经注疏》）和殷敬顺（《列子释文》）说先生表字子秉。这又引起后世聚讼不止。您能不能澄清一下？

答问：可以。这还非常有必要，因为这里牵涉到我活动的时代，远不止是姓甚名谁的问题。首先，我要郑重声

明,我并没有这个字。然而,成玄英、殷敬顺的“字子秉”说影响既广且远,直至1989年出版的《中国逻辑史·先秦卷》(李匡武主编)还在说我“复姓公孙,名龙,字子秉”。成、殷之说所本,是《庄子·徐无鬼》中所说:“庄子谓惠子曰:儒墨杨秉四,与夫子为五。”成玄英注释说:“秉者,公孙龙字也。”殷氏可能直接采取成说。宋代王应麟又重申唐人旧说,并其所持之故(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、《困学纪闻》)。从此之后,假几乎成真。不少现代学者都相信这种说法,如王琯(《公孙龙子悬解》)、胡道静(《公孙龙子考》)、陈鼓应(《庄子今注今译》)。要明白子秉并非我的字,关键在于了解我的生卒年和活动年代。这方面,现代学者钱穆在其名著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中作了最详尽而又确凿的考证,尤其把我的年代同惠施、庄周联系起来,直接驳斥了“公孙龙字子秉”说。因此,我把他的话录引在这里:“燕昭以二十八年破齐,至三十三年卒。龙之说燕昭在二十八年后,是为龙事迹最先可考之年。又下至平原君卒,凡三十三年。此下无公孙龙事。龙卒盖亦在是时。则其生当在燕吟齐宣时,惠施已老。施之死在魏襄王九年前,龙盖未能逾十龄也。龙寿当在六十七十间。相传庄周却楚威王聘,威王卒岁,周年最少亦三十,多至四十。下逮惠施之卒,周年五十至六十。时公孙龙不出十岁。”他推定,我的生卒年为公元前320—前250年,惠施的生卒年大约为公元前369—前309年。现在可以来指认“字子秉”说之非了。惠施死时,我还在童年,庄子决不可能当他面把我与他相提并论。所以,胡适也说:“公孙龙决不能和惠施辩论。”(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)更重要的是,名辩之学到了我的时候才蔚为大潮,达于极盛。在惠施时代,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法家才是显学,惠施作为名辩者在诸子百

家中并无重要地位，尤其为庄子所不屑。他认为，惠施之学只是雕虫小技，却自以为是。他说：“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，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。其于物也何庸！夫充一尚可，曰愈贵道，几矣！惠施不能以此自宁，散于万物而不厌，卒以善辩为名。惜乎！惠施之才，骀荡而不得，逐万物而不反，是穷响以声，形与影竞走也。悲夫！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所以说，即使没有年代的问题，庄子也不会把我单列一家，与四家并驾齐驱，何况我与惠施原属一家。“公孙龙字子秉”说之谬，于此自明。

不过，我们还可以从始作俑者成玄英自己的立论来辨其说之伪。今人伍非百可谓慧眼独具，其言正中肯綮。成玄英是在阐释《庄子》时作出伪说的。伍非百首先指出，他立论多失据不当。伍氏写道：“成玄英疏：‘儒，姓郑名缓。墨，名翟。杨，名朱。秉者，公孙龙字。增惠施为五。’后人因之，遂造为‘公孙龙字子秉’之说，且据之以断施龙同时。不可不辨。考玄英为贞观时道士，其所作庄子疏，颇有名。唯于古人名字姓氏，多臆造，或出真诰之类。如云庄子字子休，是其一例。此篇疏举儒墨杨秉四人，尤拉杂可笑。原疏云‘墨名翟，杨名朱’，何不云‘儒者孔丘’耶？既于杨墨各举所宗者矣，而于儒独不然，岂非以其时代不相近耶？惠施相梁，孟子以斯时来游梁。孟，大儒也，且好辩，尤好与杨墨辩，则斯时与杨墨惠辩者，宜莫如孟子矣。何不曰‘儒者孟轲’耶？今于儒家所宗，既不肯远溯孔子、辩者时代，又不复近言孟轲，而独举一乡曲詹詹小辩之郑缓，以当儒者大师之论坛，其义何居？盖玄英所见书，不出道家言，而穿凿附会又过之。故其云‘郑缓、墨翟、公孙子秉’，皆出庄子，而误解其文义，遂成缪妄。考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‘郑人缓也，呻吟裘

氏之地，只三年而缓为儒。河润九里，泽及三族，使其弟墨。儒墨相与辩，其父助翟。十年而缓自杀。’因‘郑人缓也’，遂造为姓郑名缓。因‘其父助翟’，遂谓其弟名翟。以兄弟之争，当儒墨之辩。因儒而及缓，因缓而及翟，因翟而及杨朱，极牵帅无俚。且所谓翟者，郑翟耶，宋翟耶？妙语双关，非疏证家核实者所宜有。”（《中国古名家言》）然后，他又令人信服地指出，成氏以这种臆测的态度误读《庄子》，引出我字秉的结论。伍氏说：“‘秉者，公孙龙字’亦缘误解《庄子·天下》文义而云然。《天下》谓‘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，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。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，饰人之意，易人之口，而不能服人之心，辩者之囿也’。夫惠施日以其知与人辩，其辩不必为公孙龙。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，饰人之意，易人之口，而不能服人之心，其人又不必为惠施。不过言两派学说先后辈相譬相应，未尝云及身而亲辩之也。玄英误解其义，以为施龙本人曾相与辩，则此秉者，唯与惠施对辩之公孙龙足以当之，遂臆造为‘秉者，公孙龙字’。缓无姓而有姓，弟无名而有名，龙无字而有字，皆羌无故实，不足据。”（同上）

那么，“秉”指什么人呢？我以为，明代王船山说“秉为法家”（《庄子解》），最为允当。只有法家能够在五席中位居其一。可惜，王船山的这一卓见现代学者没有注意到。当然，我也不排斥异说。伍非百就提出，“秉”指季真。据钱穆考辨，季真是齐国人，属稷下黄老道家。伍氏说他与惠施同时代（据钱穆，生卒年为前360—前290年），也好论辩，关心的问题亦与惠施相同。此外，“季”、“秉”两字形似，易误同。所以，伍氏说：“必季而非秉也。”（《中国古名家言》）清代洪颐煊认为，“秉疑宋误”（《读书丛录》），即“秉”指宋钘。宋钘

也是齐国稷下先生,其时代同惠施(据钱穆,生卒年亦为前360—前290年)。值得注意,季真和宋钐同属稷下学派。当时正是齐宣王时代,而稷下学宫在宣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,“成为当时列国的学术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”(白溪:《稷下学研究——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》)。如此看来,“秉”也很有可能指季真或者宋钐。

不过,说到表字,我倒是有的,即子石,与孔子弟子公孙龙(人称“前公孙龙”)同字。关于这一点,谭戒甫言之有理:“《盐铁论》第三十一,丞相史引有公孙龙语。王启原注:‘按孔子弟子公孙龙,字子石。七国时著书者又一人。据下所言,则平原君之客,非圣门弟子也。后又举其字为子石(按后文贤良答,有“此子石所以叹息也”之言),则二人俱字子石。龙,当读如砉。’此名字相应,似得其实。”(《公孙龙子形名发微》)

客问: 今人伍非百经考证得出结论说,今本《公孙龙子》不能肯定是先生所作,也有可能是前公孙龙所作。他的原话是:“今所传《公孙龙子》之书,为前公孙龙作,或为后公孙龙作,均有可能。但均已不可考。西汉以前之史料,不言谁作(大抵谓子石)。西汉以后之史料,则谓六国时辩士,平原君之客公孙龙作(其说始见于桓谭,谭之言不足征信)。”(《中国古名家言》)对此,不知先生想说些什么?

答问: 近代和现代学者开始对我的书发生浓厚兴趣。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。至于对我是今本《公孙龙子》的作者这个史实提出疑问,我以为真理越辩越明。说句笑话,我原本就以善辩名世。更何况我作为《公孙龙子》作者这个事实今天也还是公认的。伍非百对我的研究在现代学

林是有口皆碑的。不过，不知他怎么会口出此言。大概凡事都留下一点遗憾吧。其实《史记》里的话可以为我作证。桓谭出生前五十多年才去世的司马迁说：“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，剧子之言；魏有李悝，尽地力之教；楚有尸子、长卢；阿之吁子焉。自如孟子至于吁子，世多有其书，故不论其传云。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这清楚地说明，我在西汉时有书广为流传，而且是关于坚白同异之辩的。再来看，司马迁在给前公孙龙作传时，只说他比孔子小五十三岁，以及有书记载他的年龄、姓名和曾受业于孔子事，仅此而已。而读过《史记》的人知道，传主有著作时，太史公是不忘郑重记上一笔的。其实，桓谭并没有明言我作《公孙龙子》。倒是比他大五十多岁的刘向明确提到“《公孙龙子》十四篇。公孙龙乘白马以度关。”（《别录》，《初学记》引）这是说我作了《公孙龙子》共十四篇。总之，古本《公孙龙子》的确是拙著。

客问：虽然可以肯定古本《公孙龙子》是先生的大作，然而，我们读到的是传世至今的《公孙龙子》。有人怀疑今本《公孙龙子》不是先生的原作，而是后人伪托之作。最有名的是清代姚际恒的质疑。他说：《公孙龙子》“《汉书》所载，而《隋志》无之，其为后人伪作奚疑？”（《古今伪书考》）今本《公孙龙子》究竟是不是古本的遗存？请先生赐教。

答问：首先，回答是肯定的。姚氏的起疑，只是缘于《公孙龙子》未见著录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这个“孤证”是站不住脚的。我的著作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究竟有无著录，姑且存而不论。退一步说，即使真的无著录，也不能就因此而

断言,我的《公孙龙子》在当时已亡佚。王琯说得好:“世乱兵燹,典册播荡,即有晦显之遭,宁为真伪之界。”(《公孙龙子悬解》)是呀,即便在太平盛世,修志者也未必做到对典籍搜罗无遗。近人李笠更以事实来说明典籍的这种“晦显之遭”。他说:“古书有晦于前代,而现于后人者,即如敦煌石室书,岂宋明人所及见耶?私家秘籍偶然发现,亦不能概以伪书屏之也。即如《内经·太素》载于《隋志》而不见于后来书目,袁昶偶然获于异域,岂可言其作伪哉?史臣亦只就官有者而著录之;其散人民间者,未必如近代之旁搜博访也;故往往晦于一时耳。”(《国学用书撰要》)也是无巧不成书。宋代《文苑英华》载有《拟公孙龙子论序》,它证明我的《公孙龙子》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成书时代尚存在于天壤之间。该文作者为佚名唐人,他记述说,他对公孙龙“尝闻其论,愿观其书。咸亨二年……自嵩山游于汝阳,有宗人王先生,名师政,字元直,春秋将七十,博闻多艺,安时乐道,恬淡浮沉,罕有知者;仆过憩焉,纵言及于指马,因出其书以示仆,凡六篇,勒成一卷。”(《文苑英华·杂论上》)我们知道,《隋书》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(公元656年),与王某获观王师政所藏我的《公孙龙子》的年代略同而稍前。不难想见,当时正是离乱之后,官藏典籍多有散失,致流入民间。《公孙龙子》既为隐逸之士保有,史官不得见原属正常。事实上,诚如王琯所考证,《公孙龙子》存世的踪迹一直到梁朝,代有学者记述。王琯写道:“《汉志》《公孙龙子》十四篇,今存六篇。扬子《法言》称龙诡辞数万,似当时完本,为字甚富。《三国志·邓艾传》注引荀绰《冀州记》,谓爱俞辩于论义,采公孙龙之辞,以谈微理。晋张湛《列子注》亦引原书《白马论》,称此论现存云云。刘孝标《广绝交论》曰‘纵碧鸡之雄辩’,‘碧鸡’”